

中华民国时期华侨研究述评^{*}

李安山

华侨华人研究在 20 世纪曾 4 次引起学术界的兴趣,这均与世界经济和 国际政治有密切关系。20 世纪初,由于英国在南非引进契约华工开采金矿及美、澳等国的排华运动,华工的待遇、引进华工对本地的影响及定居国的移民政策等问题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劳动力奇缺,大批华工涌入欧洲。他们的地位、相关的国际法问题以及中国政府的相应政策又

* 本文曾得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周南京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研究员的指正,作者表示衷心感谢。文章的观点和错误概由本人负责。

T. Naylor, *Yellow Labour: The Truth about the Chinese in the Transvaal* (London, 1904); Jacques Amyot,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Manila* (Chicago, 1906); Mary Coolidge, *Chinese Immigration* (New York, 1909); George Payne, *An Experiment in Alien Labo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2). 关于中国学者在 50 年代以后对南非华工的研究,参见张芝联《1904—1910 年南非英属德兰斯瓦尔招用华工事件的真相》,《北京大学学报》1956 年第 3 期;艾洲昌《近代华工在南非》,《历史研究》1981 年第 6 期;彭家礼《清末英国为南非金矿招募华工始末》,《历史研究》1983 年第 3 期;徐艺圃《清末英属南非招工案初探》,《文献》第 22 期,1984 年。还可参见宋喆《清末华工对南非屈兰斯瓦尔金矿开采的贡献》,华冈出版社 1974 年版;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2—125 页。另外,下文所提及的个别论著,由于没有正式出版或原书未注明出版单位、出版年等,因此出版信息不全,特此一并说明。

一次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亚非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国际政治学领域(以美国学者为主)兴起了对各国少数民族的研究热。华人存在于世界各地这一事实、“冷战”气候以及五六十年代东南亚国家的“排华”现象更引起世人关注,华侨问题又一次引起学者的重视。从80年代起,中国经济的崛起成为一大奇迹,海外华人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华侨华人研究再次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

国人对华侨华人问题的关注始于明清。民国时期,学者对华侨(主要是南洋地区)的研究较为重视。本文拟对这一时期的华侨研究中的若干情况和问题做一述评,三个部分分别论及民国时期华侨研究的概况、留学生与华侨研究以及华侨研究中的理论问题。

Chen Ta, *Chinese Migra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r Condition*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923); P. G. Campbell, *Chinese Coolie Emigration to Countries within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23); H. F. MacNair, *The Chinese Abroad, Their Position and Protection,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Relations* (Shanghai, 1924).

这一时期美国学者斯金纳关于华人同化的理论对华侨研究影响较大。参见 G. W.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New York, 1957);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 (New York, 1958).

参见 Ronald Skeldon, “The Last Half Century of Chinese Overseas (1945—1995):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9:2 (Summer 1995); 福崎久一编:《华人、华侨关系文献目录》,アブア经济研究所,1996年。这种“华侨华人研究热”从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的成立(1992年)及近年来频繁举行的有关华侨华人的学术会议可见一斑。关于国际学术界90年代的研究概况,可参见李安山《中国大陆的华侨华人研究——机遇与挑战》,《世界华商经济年鉴》(2000—2001年),世界华商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2001年编印,第452—462页。参见李安山《明清时期有关华侨华人的典籍笔记和研究述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一)

《东方杂志》自1904年创刊以来,不定期地刊登关于华侨、华工和留学生的消息动态,特别是其刊载的有关法令和华侨统计数字更是难得的资料,如“侨民统计表”(第10卷第4号)和“中国侨民之统数”(第10卷第12号)提供了有关数据,“华侨调查记”(第9卷第3号)和“华工赴欧之实况”(第15卷第6号)均为有价值的资料,特别是后者记载了华工的来源及待遇问题。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九国会议讨论限制军备及太平洋和远东问题。会议前夕,该杂志发表文章,探讨会议与华侨的关系,提出华侨在侨居国应享受平等待遇的保侨方案。该刊还多次刊登李长傅等人论及华侨移民东南亚的文章及综合性论文。

从民国建立到20年代末,已有数十种关于华侨的书籍出版。根据何汉文的统计为45种,但他的统计很不完整。这些著述除个别由华侨在居留国出版或为非卖品外,绝大部分是由商务印

何海鸣:《太平洋会议保侨案提出之旨趣与华侨之觉醒》,《东方杂志》第18卷第18—19号,1921年。

例如李长傅《世界的华侨》,《东方杂志》第20卷第16号,1923年。此文综合外国学者的资料,探讨华侨在世界各地的历史、分布及境况,是一篇较早的综合性研究文章。

《关于华侨书籍一览表》,何汉文:《华侨概况》,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令人不解的是,一些较有分量的著作均未包括在一览表里,如薛平山《华侨与革命》(华侨协会1926年版)、张相时《华侨中心之南洋》(海南书局1927年版)、瞿世英编《华侨与平民教育》(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8年版)、胡炳熊《南洋华侨殖民伟人传》(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28年版)等。

如荷属华侨学务总会编《华侨教育年鉴》(1928年)和南洋协会编的一些内容涉及华侨的著作,又如方半农《侨魂》等。

书馆、中华书局和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三家出版。这些早期著作主要是关于东南亚华侨的,且描述编译为多,研究分析较少。温雄飞的《南洋华侨通史》(东方印书馆 1929 年版)对南洋华侨历史做了综合性的探索。此外,较有学术价值的还有暨南大学刘士木的《南洋概况》(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李长傅的《华侨》(中华书局 1926 年版)和《南洋华侨移殖史》(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等著作。

从 20 年代始,中国学者已经开始注意翻译国外关于华侨的重要著作。美国学者宓亨利《海外华人的地位及其保护》的中文版于 1928 年以《华侨志》为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日本学者长野朗于 1928 年写成《支那民族之海外发展》一书,较详尽地论及华人移民世界各地的情况。该书出版后立刻引起国人注意。曾在早稻田大学留学而后在伊利诺斯大学获政治学硕士的黄朝琴立即将其翻译出版,书名改为《中华民族之海外发展》(1929 年)。此书于 1983 年由台湾的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作为南洋研究史料丛刊第 6 集重印出版。

30 年代是华侨研究的一个高峰期。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成立对方兴未艾的华侨研究无疑是一个推动。一批研究成果相继出版。1931 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何汉文著《华侨概况》综合

中国国民党于 1924 年改组后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海外部,专司海外移民间之党务工作。1928 年该部改为侨务委员会。不久,五院成立,在行政院之下设置侨务委员会。原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海外部改称为海外党务委员会。参见陈里特《中国海外移民史》,中华书局 1946 年版,第 60 页。

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敬熙《华侨问题之研究》(1931 年)、鲍明铃《在外华侨之地位》(1932 年)、王云五和李圣合编《南洋华侨》(1933 年)、王辟尘《各国待遇华侨苛例概要》(1933 年)及中华书局出版的刘士木和徐之圭合著《华侨概览》(1935 年)、刘伯周编《海外华侨发展史概论》(1935 年)、朱华雨《华侨社会生活与教育》(1936 年)、陈直夫《澳洲及旅澳华侨》(1937 年)、薛典曾《保护侨民论》(1937 年)。

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分别论述了“华侨之状况”、“华侨之问题”及“中国与华侨”三个问题。在“华侨之状况”和“华侨之问题”两章中,作者对欧洲各国、南非、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西印度群岛、澳洲及南洋各地的华侨概况和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歧视和排华)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实无必要向海外发展,但中国的政治变化促使国人移民海外;华侨与中国未来产业的关系密切,在资本、人才及中国发展后对南洋地区的影响等方面均与华侨有直接关系。此书的附录相当全面,共分三类。一为政府关于华侨问题的各种文件(如请确定整理任务方案案、华侨登记规则等)共10种;二为有关华侨机构或华侨人口的各种统计表格(如“驻各国中国使领馆一览表”、“华侨所在地鸦片专卖统计表”和各地华侨人数统计)共11种;三为研究华侨问题的各种资料目录(“华侨杂志月刊一览表”、“南洋华侨日报一览表”和“关于华侨书籍一览表”),共3种。30年代的研究已开始涉及一些理论问题,主要是关于“华侨”的身份及定义。这一点将在下文论及。

李长傅是研究华侨的大家之一,他的《华侨》是中国最早的关于华侨问题的综合性著作之一。随后,他又撰写了《南洋地理志》、《南洋华侨移殖史》、《菲律宾史》、《南洋华侨概况》、《南洋华侨史》、《南洋史纲要》等书,其代表作是1937年出版的《中国殖民史》(上海商务印书馆)。他在例言中指出,该书以“中国殖民史”或以“中国移殖史”做书名均可。这表明作者将“殖民”与“移民”等同,“所谓中国狭义的殖民实含有移民之性质,而移民亦含有狭义殖民之性质”。此书分5章,“总论”对殖民之意义、中国殖民之地理环境及中国殖民之动因进行了分析,并将中国殖民分为4个时期: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本文使用的是商务印书馆1998年重印本,第4页。

殖民初期、鼎盛时期、中西势力接触时期和欧人势力时期,其余四章重点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殖民活动。作者较重视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提出经济动因为“为中国殖民之主要动因”,这是颇有见地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华侨殖民论”的代表作之一。李长傅在40年代继续研究东南亚各地华侨的历史与现状,在《南洋研究》上发表了《泰国华侨之发展》、《荷印华侨之发展》和《菲律宾华侨之发展》等重要论文。

这一时期出版的重要著述还有金陵大学文史教授刘继宣和文史讲师束世澂合著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此书旁征博引,对汉代以来中国人移民南洋的历史进行了总的梳理。在“导言”中,作者明确表示,“愚等之为此编,或于唤起民族之自觉心,恢复民族之自信力,不无裨益乎?”此书最大的特点是史料相当丰富,共引用中外文书目160余种之多,其中既有中国的官方资料(如《外交公报》和《海关贸易统计月报》),也有华侨居留国的官方资料(如菲律宾的海关报道、荷属印度的移民报告);既有国家的侨务报道(如侨委会《华侨快览》),又有地方志;既有古代文献,又有当代研究华侨问题的名家著述。此外,作者还参考了英文和日文文献。即使用现在的标准看,这一著作也是极具学术功力的。

从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学者的研究转到华侨与抗战这一方面。林云谷于1938年出版《抗战与华侨》(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一书,此书仅52页,却将华侨研究的重点转到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相关的问题上。黄警顽著《华侨对祖国的贡献》由上海棠棣社于1940年出版。该书论述了东南亚华侨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献的各种壮举。书中提到缅甸华侨妇女叶秋莲将家产首饰拍卖所得3万元尽

分别见《南洋研究》第9卷第1、2期,1940年。

刘继宣、束世澂:《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国立编辑馆1934年版,“导言”,第11页。

数捐献给祖国的抗日战争,自己无以维生而削发为尼,这一事迹至今读来仍感人至深。此外,黄警顽还主编了《华侨革命史迹》(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1933年版)和《华侨问题专号》(上海长风书店1940年版)。华侨研究因抗战而日显重要,除上海、广东外,重庆、昆明、建阳、泰和等地都出版了有关华侨的刊物。

抗日战争实际上成为华侨研究一种新的推动力,这由下述因素使然。首先,一批有识之士流亡到东南亚地区(主要集中在新加坡),他们中间的知名学者有胡愈之、郁达夫、王任叔、杨骚、汪金丁等一批进步文人。这些人的到来使东南亚地区在政治上曾一度相当活跃,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本营。文化人的聚集从客观上推动了对这一地区华侨的研究。其次,1940年3月由关楚璞、郁达夫、姚楠、刘士木、张礼千、许云樵等人发起成立了新加坡中国南洋学会。该学会对中国研究海外华人史“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再次,战时中国经济衰败,一些沿海地区主要靠侨汇为生,侨汇也成为中国后方的重要财政来源。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中国学者对侨汇来源地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华侨在抗日战争中

这批人的重要性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第一,廖承志于1941年专门派王任叔、陆诒和张企程等人到新加坡工作。第二,一批学者在当地著书办报,十分活跃。第三,鉴于此地中国知识分子聚集,周恩来于1946年特地派遣夏衍专程到新加坡从事统战工作。对于这一重要的流亡群体国内尚无专人研究。国外的研究可参见林万菁《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9—1948)》,万里出版社1994年修订版(初版时间为1978年)。

姚楠:《南天余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关于新加坡中国南洋学会的历史资料,散见于各种回忆录,目前尚无专著出版。

1937—1945年间,侨汇总数约为7.24亿美元。参见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表31,第57页。1939年全国的侨汇为12亿元国币;据美国邮政总局报告,美国华侨汇款为3500万美元,折算为6.5亿元国币;新马侨汇为1.67亿元。林家劲等:《近代广东侨汇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侨汇的研究,参见该书第69—76、180—189页。

表现出来的极大的政治热情引起了国人的注意,学者对华侨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更促使他们对这一社会群体进行研究。

1942年,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和教育部在重庆创办南洋研究所,这是国内第一家专门研究东南亚的正式机构,为后来的华侨研究打下了基础。后来对华侨研究颇有贡献的几位学者(如朱杰勤和姚楠等)均在南洋研究所工作过,并发表了一些著述,如姚楠的《马来亚华侨史纲要》(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马来亚华侨经济概况》(南京南洋经济协进会1946年版)和《中南半岛华侨史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等。除历史研究外,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华侨保护、华侨教育和华侨经济上。丘日庆的《华侨保护论》(海外通讯社1941年版)和余俊贤撰《侨民教育实施方案》(1943年)涉及战争中华侨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华侨经济的研究与侨汇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一方面出版的著作有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1940年)、《福建华侨经济》(厦门太平洋协会1940年版)、中国经济研究会出版的钱承绪《侨务回溯与侨民经济》(1940年)和姚会阴的《广东省的华侨汇款》(重庆,1943年)等著作。

抗战胜利后的华侨研究并不景气,主要是国内战乱和政局不稳所致。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李朴生《华侨问题导论》(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丘汉平《战后华侨问题》(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5年版)、张荫桐译《南洋华侨与经济之现势》(1946年)、刘令编《华侨人物志》(东西文化出版社1949年版)等。冯自由也是民国时期研究华侨问题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华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华侨革命史话》(重庆海外出版社1945年版)和《华侨革命开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至今仍是研究华侨与辛亥革命之关系的必要参考书。

值得一提的是,陈里特的《中国海外移民史》是继李长傅后另一

部研究华人海外移民的综合性史学著作。与《中国殖民史》不同,陈里特将移民史分为三个部分。前两篇“移殖篇”(分胚胎 即胚胎、萌芽、长成和中衰 4 个时期)和“政策篇”(分劳绩与上国自尊、崇拜外人和自立自强 3 个时期)均按历史叙述;“史训篇”按专题,分为惨案、猪仔和取缔 3 节。《中国海外移民史》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统计数字和各类表格较多。全书共有各类表格 20 种,如根据史籍整理的中国往来国外舰船名称、郑和经历国家国名西汉对照、世界各地华人移民统计表、猪仔成本约数表、猪仔在船上死亡数和猪仔在船上反抗表等,特别是关于各地移民和契约劳工的表格较多。第二,注释详尽具体,史料相当丰富。当时一般作者对注释多不够重视,有的仅为装饰点缀而已。陈里特的注释十分详尽,多有引用原文者。其史料来源也颇为丰富,并采用了不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档案资料。第三,对华侨为抗战所做贡献和侨营事业已有所涉及。陈里特在书中除列举华人移民在居留国所创造的业绩外,还阐述了他们对中国的贡献。他整理了华人移民在抗战中的捐款数目和在国内各项事业中的投资,认为“移民在国内之投资,从事地方建设,消纳公债等之数字亦属惊人”,贡献卓著。

民国时期,高等院校已直接参与华侨研究。除厦门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外,暨南大学在这方面尤显突出。首先,华侨问题研究专家李长傅、刘士木、丘汉平等一批治学严谨功底深厚的学者曾执教于暨南大学,培养了一批华侨问题研究人才。其次,1927 年成立的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旨在指导南洋华侨一切改进事宜及南洋各种问题之研究”;1930 年更名为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美洲的华侨也成为该部的研究对象;1934 年又改成海外文化事业部。再次,南洋文化事业部创办的《南洋研究》、《南洋情报》、

陈里特:《中国海外移民史》,中华书局 1946 年版,第 44 页。

《中南情报》和《华侨情报》等刊物及时报道华侨动态和有关研究成果;特别是《南洋研究》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华侨问题的主要刊物。最后,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出版了一套有关华侨问题的“南洋丛书”(40种)和其他相关著作。

民国时期华侨研究的另一特点是专业杂志的出现。除上海的《华侨杂志》(1913年创刊)和暨南大学的《南洋研究》(1928年创刊)外,还有广州岭南大学附属华侨学校于1923年创办的《南大与华侨》,初为双月刊,从第10卷起改为季刊,连续发行10余年,较系统地刊载了研究文章和华侨史料,是一种资料性较强的杂志。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华侨杂志。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湖南衡阳人何海鸣创办的《侨务旬刊》。何海鸣虽未曾有过出国经历,却认识到华侨的重要作用。他曾在北京平民大学领事系讲过“海外华侨拓殖史”。《侨务旬刊》创刊于1920年,总社设在北京,分社设在上海,并在东南亚的一些城市和美国的芝加哥设有海外分部,与海外华侨联系较广。《侨务旬刊》共出版141期,每期刊登各种与华侨有关的信息。该刊发表或转载了不少有关华侨史的论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开吧历代史记》(第59期)和《南洋华侨史略》(第120期)等。姚楠先生认为《侨务旬刊》对中国华侨研究

较具影响的有胡炳熊《南洋华侨殖民伟人传》(1928年)、刘士木和钱鹤合编《华侨教育论文集》(1929年)、长野朗《中华民族之国外发展》(黄朝琴译,1929年)、李长傅《南洋华侨概况》(1930年)和《南洋华侨史》(1934年)、钱鹤《南洋华侨学校之抽查与统计》(1930年)和《南洋华侨教育会议报告》(1930年)、吕家伟《华侨运动之意义及其计划》(1931年)、林珠光、朱化雨编《南洋华侨教育调查研究》(1936年)、刘士木《日本海外侵略与华侨》(1937年)、程天放《东南亚之华侨》(1937年)等。如上海的《华侨教育》(1932年创刊)、青岛的《华侨》(1940年创刊)、南京的《华侨通讯》(1947年创刊)、广州的《侨声》和《大汉华侨》、福建的《南侨通讯社—乙种稿》等。这些地方性的侨务杂志主要以传播信息为主,较少刊登研究性文章。

贡献卓著,是“研究东南亚史和海外华人史的先驱”。

民国时期,政府部门出版的一些杂志也刊登关于华侨的信息和研究文章,如外交部出版的《外交公报》(月刊,1921年在北京创刊)、《外交公报》(月刊,1928年在南京创刊)等。这些刊物上关于华侨的稿件主要由当地领事馆提供,内容包括中国政府的华侨政策或各国对华侨的法令。此外,这些刊物还报道当地华侨的活动或领事馆与当地政府交涉的情况。民国时期的侨务部门也不时出版侨务统计、法规汇编、年度报告、资料说明等。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和国民党海外部曾出版几种刊物,如《中央侨务月刊》、《华侨周报》、《侨务月报》、《侨务周刊》、《侨务季刊》、《海外月刊》、《华侨半月刊》等,其中除提供华侨人口数字外,还有一些关于华侨政策的论文或综述性文章。

《华侨周报》(1932—1933年)由侨务委员会侨民教育处负责,共出版44期,于1933年6月停刊,改为《侨务月报》。该刊从创刊号起每期刊登各地华侨的统计人数,并配有各地华侨学校和社团等方面的数据,一些文章也为了解海外华侨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如第1卷第2期发表了何长祺的文章《南非洲侨务之最近观察》,较系统地陈述了南非政府对华人施行的种种苛例,并就外交交涉提出自己的看法。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的《国际劳工通讯》上也不断有关于华工的文章。此外,《华侨战士》、《华侨先锋》等官方或半官方杂志也不时刊登一些论文和资料。当时国民政府有关机构关于华侨的信息比较公开,各政府部门的杂志公开发行,这无疑有助于对华侨问题的研究。

姚楠:《南天余墨》,第4—5页。关于何海鸣的生平,可参见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著作学术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二)

留学生一直是海外华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他们未来去向的不确定性,对他们的报道多而研究少。对留学生研究不多还与当时华侨问题专家何汉文的观点有关。他认为,“留学生在中华民族海外发展上,没有多大关系”。这一观点值得商榷。笔者认为,留学生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与华侨研究密切相关。从研究对象而言,他们构成了华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研究资料而言,他们关于海外留学生活的亲身记载成为研究华侨的重要史料;从研究主体而言,他们的相关论文或后来对华侨问题的深入探讨大大推动了民国时期的华侨研究。

黄遵宪著《留学日记》(1933年出版)真实记录了清末留日学生的情况,是研究改革志士在日本活动的重要史料。陈寅恪之弟陈登恪用笔名所著《留西外史》及中国作家王独清的《我在欧洲的生活》(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版)等均以文学传记的形式记述了作者在欧洲留学、工作或亲身经历的留学生和旅居国外知识分子的情况。此外,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海外工读十年纪实》(1932年)真实地记录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生活。

在这一时期,有关留学生问题的较有系统的专著是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此书作为“教育丛书”于192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作者曾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过《中国留学生小史》,对留学生历史颇有研究。《近代中国留学史》共分15章,对近代60年来中国人留美、留欧和留日学习的历史做了系统考察,并对留学的各种类型及各个专题进行了论述,如“官绅游历贵胄游学女子游学”、

何汉文:《华侨概况》,第4页。

“留学资格与经费”、“留学管理”、“留学奖励”、“留学思想之变迁”等。针对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弊病,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国家应调查国内学术界之需要,通盘筹算。第二,个人应有为学术而学术的决心,并对相关学科有适当的基础。第三,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式教育与高等科毕业生一律派遣赴美的办法应取消。第四,官僚的游学学生监督与具文的游学管理规程应完全取消。第五,自费生名额不必限制。作者认为,留学生不仅要学习,更要研究,强调研究学术以改进本国文化才是留学的惟一目的。这种看法对今天中国的留学工作仍有启迪作用。作者治史严谨,所附资料均有出处,所附表格21种十分详细,如留学经费、学生出身、学科统计、学生人数、“毕业支配”、女生情况等。作者将参考书籍目录分为三类:“书本”、“论文及报告”和“公牒”。其中论文选自各种教育期刊(如《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教育丛刊》、《安徽教育界》等)。这是民国时期研究留学生问题的最有分量的专著。

何汉文关于留学生对中国海外发展关系不大的观点显然有失偏颇,民国时期真正使华侨研究走向世界的正是一些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学者,这是当时华侨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些留学生有的系统研究居留国华侨政策的历史沿革,有的详尽分析海外华侨的社会状况,有的对侨乡进行实地考察。由于他们中文和外文兼通,又接受了不同学科背景知识的教育,熟悉西方较先进的研究方法,加之他们的研究成果多以外文形式出版,因此在这一领域很快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有的成为研究中国人口或移民问题的学术权威。

李天录(Tien-lu Li,北京大学英文教授)在美国的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于1916年完成了题为《美国国会对中国移民的政策》的博士论文,同年由卫理公会

主教派教会出版。英文全书共 13 章,分别对 1868—1904 年间美国排华法案和与华人移民有关的中美双边条约进行了分析。当时,美国学术界存在着关于华人移民的各种观点,有的纯粹从美国社会经济利益的实用角度出发,对移民政策中的道义问题置之不理;有的认为政府的排华政策完全合法。李天录认为,移民权既是一种社会权利,也是一种自然权利,因为这是一种纯粹按照经济法则与商品和劳动力供给要求来行使的个人权利。“一个人不能被合法地剥夺在能得到更好报酬的地方从事合法工作的权利。”他揭示了排华法案的制定和实施与美国各党派的利益关系,并批驳了华人“不可同化”和“使国家贫困”的论调,认为这只是在为排华编造理由。最后,他综合一些明智的美国人的意见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为华人在法庭作证提供帮助;鼓励华人将妻子带来;教育华人后代;给予华人普选权。书后所附“1880 年美国华人分布表”和“1820—1910 年到美国的中国移民”等附录尤有参考价值。虽然这是一部研究美国移民政策的著作,但它与华侨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第一部用英文公开出版的系统研究

这些条约和法案为 1868 年条约(即蒲安臣条约)、1880 年条约(即蒲安臣条约修正案,又称中美续修条约)、1882 年排华法案(即美国参议院第 71 号法案)、1884 年排华法案(1882 年法案的修正案)、1888 年排华法案(斯科特法案)、1892 年排华法案(吉亚里法案)、1893 年排华法案(吉亚里法案的麦克里亚里修正条款)、1894 年条约、1902 年排华法案和 1904 年排华法案。

Tierlu Li, *Congressional Policy of Chinese Immigration or Legislation Relating to Chinese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Tenn.: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916). 作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基于他人生的两个偶然事件。他读大学时正值美国政府实行排华政策,中国人也在抵制美国商品;留学美国期间,他曾被无故拘禁在天使岛拘留所,从而对华人遭受的歧视待遇有切身体会。此书不仅是对美国移民歧视政策的分析,也是对美国华人境况的研究。此书 1978 年由纽约阿尔诺(Arno)出版社再版。

与华侨有关问题的学术专著。

民国时期的另一部较有分量的研究华侨的英文著作是吴景超的硕士论文《太平洋地区的中国移民》(1926年初版,1974年再版)。吴景超是我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23年入明尼苏达大学主修社会学,毕业后于1925年入芝加哥大学继续进行研究生学习,师从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R. E. 帕克和 E. W. 伯吉斯等。帕克教授对人种关系素有研究,一直探讨“种族偏见”和“种族冲突”的问题,并提出了“种族关系循环论”。吴景超从这些世界著名学者那里接受了现代社会学的系统训练,他的硕士论文对太平洋的三类国家或地区的华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人口进行初步统计的基础上,他考察了中国人移民原因中内部推力和外部拉力等因素。他还运用人类生态学的新方法研究了华侨的人数和性别分布、婚姻状况和社区生活,并得出以下结论:缺乏女人的华侨社区无法在当地深深扎根;不均衡的性别分布导致与异族通婚;海外的华侨社区永远处于变动之中;所有太平洋沿岸的白种人国家均立法禁止或限制中国移民入境。虽然这种以人种划分区域的方法已经过时,但他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

“种族关系循环论”(race relations cycle theory)是一种种族同化理论,认为种族间的同化过程如下:接触(contact) 竞争(competition) 冲突(conflict) 适应(accommodation) 同化(assimilation)。参见 Robert E. Park, *Race and Culture* (New York, 1950)。

三类国家或地区指的是黄种人地区(日本、朝鲜、台湾、香港、澳门、法属印度支那、暹罗),棕种人地区(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夏威夷群岛、菲律宾群岛、英属波罗洲、文莱、新几内亚、太平洋岛屿)和白种人地区(阿拉斯加、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巴拿马运河区、澳大利亚、新西兰)。

Chingchao Wu, *Chinese Immigration in the Pacific Are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Dissertation, 1926, Reprinted in 1974 by R. & E Research Associates) .

吴景超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1928年)是我国学者第一篇深入研究海外华侨社会的学术论文。论文从华人“发现”美洲开始,论述了华人在美国的生存环境、华人的移民方式、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及华人的家族与家庭生活、帮会与帮会争斗及各种与唐人街有关的社会现象,如异族通婚、文化冲突和华人同化等问题。此文的最大特点是从世界移民史的角度考察了美国华人移民问题。刘南明(Nanming I. Liu, 音译)是在国外发表的研究著作中涉及华侨问题的另一位中国学者。他在法国留学,并在巴黎大学获博士学位,其专著《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于1935年在位于日内瓦的中国国际图书馆以法文出版。书中第8章“移民运动”中有一节专门论及海外华侨,分别论述了华侨的分布:亚洲(11019016人)、大洋洲(18354人)、美洲(309359人)、欧洲(45629人)和非洲(5751人),并对他们的移民方式进行了分析。

陈达是当时国际上颇有名气的研究移民问题的中国学者。1923年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于当年回国,长期执教于清华学校(后更名为清华大学),曾发表过多部研究移民的专著,如《日本移民中国》(*Japanese Emigration to China*, New York, 1922)、《中国移民——关于劳动条件的专门考察》(英文,1923年)、《人口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和《华南侨乡》(英文,1940年)等专著。与李天录和吴景超不同,他回国后一直从事与华侨有关的研究。可以说,他是我国第一个受过专门训练并坚持系统地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专业学者。他写的多部著作不仅对华侨

吴景超著,筑生译:《唐人街:共生与同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Nanming I. Liu, *Contribution a L'Etude de la Population Chinoise* (Geneve, 1935)
pp. 186—197.

研究起到了开拓性作用,而且为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

《中国移民——关于劳动条件的专门考察》是陈达为美国联邦劳工部撰写的报告书。该报告书根据当时有中国移民的各居留国(地区)的官方统计数字和有关资料,对日据台湾、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英属马六甲、美属菲律宾及夏威夷、南非德兰士瓦和法国的华侨状况进行了分析。其研究目的主要在于分析以下几个问题:中国人移民国外的原因及方式;华侨在新环境中何以谋生及适应环境的办法;华侨对居留国及中国的贡献;如何解决因中国现实状况而导致的大量移民以及因这些中国人移民他国而造成的国际纠纷等问题。该报告书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近代中国人大量移民出国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经济条件无法赶上人口增长;第二,中国移民对居留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些居留地政府的税收有相当部分来自华人社会;第三,中国移民在南洋的经济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欧洲人的合作伙伴及欧洲人与当地居民的中间人;第四,中国移民关心中国,以实际行动极力促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及工业化;第五,海外华侨社会和中国政府应为弘扬中华文化负起责任。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是太平洋国际学会1933年会议上确定的由陈达负责的研究项目。他选择广东潮汕地区和福建漳泉地区为抽样调查地区。全书分为2篇9章。第1篇为华侨社区研究,分为环境和社会变迁的原素两章。第2篇为社会变迁的原素之一移民的研究,共分7章,分别对非华侨社区和华侨社区的生计状况(主要职业、副业、其他职业、侨汇)、衣食住(家庭入款和家庭费用)、家庭与婚姻(家庭的组织与功用、妇女的地位、孩童的地位、财产的分配、婚姻与家庭的关系、移民对于家庭和婚姻的影响等)、

社会觉悟、教育、卫生与娱乐、信仰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比较研究。由于这一著作对南洋华侨生活方式的形成、闽粤侨乡社会状况的变迁、华侨与侨乡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所附资料极其丰富(共有 30 余种表格),因此成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南洋华侨社会与闽粤侨乡社会状况的经典之作。日本人于 1940 年将此书译成日文,列为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南洋华侨丛书之一。同年,该书的英文版在纽约出版。

陈达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他引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中国最早受过系统训练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特别重视实地调查研究。在《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的撰写过程中,他采取了家庭采访及实地考察的比较研究办法。这种用实地考察研究东南亚华侨的方法,实际已走在欧美学者的前面,为后来中国的社会学和华侨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他的研究十分严密系统。例如,在《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第 9 章关于华侨信仰的研究中,他论述了信仰与农民的生活、关于治安的信仰、关于职业的信仰、关于嗣续的信仰、关于生活状况的信仰、其他的信仰、信仰的变迁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十分详尽。第三,他的研究往往个案调查与整体分析相结合,对华侨劳动条件的研究如此,对侨乡的研究也是如此,对南洋华侨社区的研究同样如此。第四,他的研究不仅对国内学者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国际学术界也享有名望,表明中国学者已走向世界。

(三)

早在 30 年代,华侨研究已从直观描述进入理论探讨,“华侨”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的身份及定义是重要问题之一。当时的学术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其一是“华侨殖民论”。清末华侨研究的先驱之一梁启超提出了“华侨殖民论”。对此,一些学者表示赞同,并在著作标题或著述中采用“殖民”或“拓殖”的说法。这一论点对民国时期的华侨研究有较大影响。从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刘继宣与束世澂合著《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胡炳熊《南洋华侨殖民伟人传》的标题即可看出作者对华侨实质的理解。何汉文也受“华侨殖民论”的影响,认为华侨在南洋的经济“已有牢不可破之基础”,因此,南洋“在政治上虽有英领荷领法领之属国地,但从实际的经济上说,则可称为‘中国人之南洋’……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讲实利主义的民族,政治的侵略,是决不讲求,他们的侵略,是经济的,但是也是最下层,最深刻的一种侵略;使人在表面很少注意,最难对付。”第二种观点是刘士木与徐之圭给“华侨”下的定义:“华侨云者,系由……当时为中国之领土地域而移殖于外国领土之中国人或其子孙之居留于外国领土者也,但其国籍之如何,则在所不问也。”该一定义避开了关于华侨身份的关键问题——国籍问题,因此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第三种观点是法学家丘汉平的“华侨即移民”的观点。《华侨问题》是他关于华侨的代表性著作,收入商务印书馆“现代问题丛书”。他对“华侨殖民论”持批评态度,同时对刘士木等人避开国籍问题而就事论事的“华侨者,华侨也”的观点也不赞同。作者认为,华侨的身份问题须按法律解决,并根据中国《国籍法》对“华侨”做出定义:“凡是中国人移殖或侨居于外国领域而并未丧失

此论源自梁启超著《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新民丛报》第63号,第81—88页。还可参见《华侨华人百科全书·著作学术卷》,第185—186页。

何汉文:《华侨概况》,第219—220页。

刘士木、徐之圭:《华侨概观》,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页。转引自丘汉平撰述、庄祖同助编《华侨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页。

中国国籍的,叫做‘华侨’。”据此,他分析了与这一定义相关的三个因素:中国人移住或侨居外国领域、外国领域与中国领域的区别、并未丧失中国国籍。这一定义可以说是在众说纷纭的学术界为“华侨”正名,并沿用至今。

丘汉平还阐述了另外几个理论问题。首先,他分析了“殖民”与“移民”的区别。他认为,移民和殖民有三点不同:目的不同、目标地不同、政治含义不同。“‘殖民’是指本国人民移殖到国外的地方,具有永久居住的意思,而仍与本国政治发生关系。这种移殖,不外是拓广本国的领土以为解决民族生活为必要的条件,所以是‘拓殖’(colonization)。人民到此等地方去求生存的,便是‘殖民’(colonist, colonizer),如英国之拓殖澳洲是。”他认为,殖民的条件有两个。第一,其所居住或开发地方是荒地,或未开发地,即未经各国占领过的。第二,向外移殖的人民含有团体或政治意味。“移民”则完全不同。它是指本国人民移住国外,以谋生为目的,而无久居之意;移民对移居地与本国不发生政治上的联系。移民大部分是私人行为。可以看出,丘汉平对“殖民”(如英人殖民澳洲)和“移民”(华人移民东南亚)的解释与后人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虽有所不同,但较为接近。早期华人移民均抱有“出外赚钱”和“叶落归根”的想法,绝大部分人的初衷并无久居他国之意。其次,作者就居留在英、美、荷、法等殖民地的华侨的国籍问题分别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各个殖民地不同的国籍法及对华侨的影响。这实际上相当于对各国的华侨华人政策进行分析,不仅在当时学术界颇为难得,同时对国民政府制定相应政策也极有帮助。第三,他还就中外(中美、中英、中法、中日、中秘、中墨)诸条约中涉及的侨民权利

丘汉平撰述、庄祖同助编:《华侨问题》,第4页。

丘汉平撰述、庄祖同助编:《华侨问题》,第6页。

问题分国别进行了分析,这在当时的学界尚属初次。丘汉平从法学的角度对华侨的地位(如国籍、政治待遇和保护等问题)和生活(如文化教育、社会、经济、团体及早期失业等问题)分别进行了探讨。《华侨问题》一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其学术价值却显而易见。

这一时期在华侨研究中较有影响的理论是“华侨民族主义论”或“华侨爱国论”。

“华侨民族主义论”有两种主要的表达方式。首先是1916年孙中山在《致海外革命同志书》中提出的“华侨革命之母论”,即华侨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始于华侨社会,革命党的首批成员和中坚分子均为华侨,各种捐款赞助的筹集主要是在华侨中间进行,辛亥革命的组织者也有很多为华侨。这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促使了“华侨革命之母论”的产生,而这一观点对学术界影响颇大。张永福的《南洋与创立民国》(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胡汉民的《南洋与中国革命》(1933年)、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和《华侨革命开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等论述华侨与辛亥革命之关系的论著都持“华侨革命之母”这一观点。

《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的导言对此慷慨陈词:“此千万人日与他族周旋,晓然于利害,其爱国心盖较国内人士为尤切。历届革命,每得海外侨胞经济之援助,动辄数十百万,问所从来,十九皆出自平民……盖每遇革命之所需,吾侨恒不惜倾家荡产以赴之,其爱国之诚,可以动天地泣鬼神矣!”李长傅在《中国殖民史》中明确

例如孙中山1916年曾指出,“前时帝制之破坏,华侨实为一最大之力。”《在沪欢迎从军华侨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4页。

刘继宣、束世澂:《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第1—2页。

表示：“华侨于祖国政治，亦极关心，中国革命之成功，海外华侨其主要功臣也。”华侨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确实为革命做出了极大贡献。他们之所以支持辛亥革命有多种原因，如晚清政府的腐败和华侨对世界潮流的认识，华侨资产阶级在海外的社会地位与其经济地位之不相称，华侨在受到外国统治者的歧视和居留国资本的压制后对一个强大祖国的向往，流亡海外的改革派和激进党人形成的革命组织和中坚力量的宣传发动等。这些因素的有效结合使华侨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华侨民族主义论”的第二种表达形式是汪金丁的“南洋华侨文化优越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难当头使华侨和流亡国外的学者对祖国的担忧和眷念日益加深，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随之增长。这种情感深深影响了当时在海外从事华侨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学者。著名学者汪金丁于1937年从上海移居新加坡，并从1938年起为当地的《狮声》、《晨星》和《星火》等副刊撰稿，积极参与推动《狮声》发起的南洋文化通俗化运动。1941年4月6日他在《南洋商报》星期刊发表《南洋华侨的文化》一文，较系统地阐述了“南洋华侨文化优越论”。他认为，南洋华侨文化运动有以下特点。第一，南洋各属华侨经过艰苦创业积累了一笔财产，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受到当地政府的百般限制。这种境遇强化了他们的爱国思想，民族自信心更加强烈，遂成为“革命之母”和祖国抗战的主要支柱。第二，华侨实业家不同于中国的买办性资产阶级，是具有独立性的民族资产者。他们既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又痛感祖国工业处于附庸地位，迫切要求争取民族解放。因而南洋华侨具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第19页。

关于华侨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之关系的研究甚多，但主要是论文（集）和资料汇编。有关专著可参见任贵祥《孙中山与华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有比国内人民更加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第三,南洋华侨的文化水准普遍高于中国国内的文化水准。这主要表现在南洋华侨的教育普及率高于中国国内。

“华侨民族主义论”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它充分肯定了华侨的革命历史作用,进一步激发了华侨的爱国情绪。然而,这一理论的片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这一理论忽略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因素。中国革命(包括辛亥革命)的基本要素只能在中国本土形成;革命的思想只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发育成熟;革命的组织只能在中国民众中发挥作用;革命的主要力量只能是中国国内的人民大众。作为一种社会现实,革命本身也是中国内部各种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由于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均有侨居海外的经验,加之海外华侨对革命的鼎力相助,致使他们往往忽略了国内支持革命的社会基础。由于对华侨贡献和华侨文化的过分强调和对国内革命力量的相对忽略,这种理论在解释中国革命的主要因素和革命动力时有失偏颇。

其次,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流露。可以看出,“华侨民族主义论”与清末的“华侨殖民论”有思想上的联系,这两种理论均反映了面临危机时中国知识界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正是这种民族意识使民国时期的主要研究著作在观点上仍受“华侨殖民论”的影响,行文中流露出我族中心主义。例如刘继宣和束世澂在《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中论及民族特性时宣称:我国民族,有坚忍不拔、刻苦耐劳之性质,白人尤远不如,土人虽亦能耐劳,然智力甚拙。“以此种种,我国民族,遂天然为南洋之主人翁。白人

南洋华校当时估计达3000所以上,1100万华侨有100万人受教育,比率高于中国受教育人数。参见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著作学术卷》,第344页。

虽拥有政治势力,然欲开发土地,则舍华侨不能举,此侨民立足点也。”实际上,这种我族中心主义往往容易刺激华侨居留国的其他民族,并不利于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和发展。

再次,中国中心论的影响。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华侨民族主义论”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为主导,置华侨居留国的国情因素于不顾;对周围国家或地区的利益视而不见,甚至将东南亚看作中国的当然“殖民地”。其二,这种理论将华侨的历史看作中国历史的延续或组成部分,从而忽略他们在中外交流史中重要的桥梁作用。其三,“华侨民族主义论”重视华侨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贡献,忽略他们在居留国的地位和对当地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强调他们与中国的联系,而忽略他们与当地民族的相互关系。从某种角度上说,这种方法论也使研究者的视野受到局限。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华侨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各方面对华侨问题的重视使得研究质量普遍提高。随着对华侨问题的关心,研究著作大量出版,这在30年代尤为明显。这些著作从一般描述转入较为深入的研究,从而使华侨研究的水平大大提高。同时,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和专业杂志的出现也大大促进了华侨问题的研究。

第二,华侨研究已经走向世界。一些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归国学者在使用社会学方法、进行实地考察或对政府档案的研究等方面已经走在西方学者的前面;他们也因之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华侨问题的知名学者。

第三,研究范围扩大。除南洋地区的华侨研究外,一些综合性的著作或专题性的论著也相继出版。有的涉及宏观思考,有的探

刘继宣、束世澂:《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第184页。

讨理论问题。一些学者在西方受过教育后回到国内,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其中关于侨乡、侨务和华工华侨的研究著作已具有国际水平。

第四,对一些理论性问题进行了探讨。这包括华侨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等,有的著作已经注意到华侨身份的变化。

耐人寻味的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华侨研究因国内战争而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不过,冷战的到来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却使国际学术界重新注意在20世纪曾两度引起他们兴趣的“华侨”问题,从而导致了五六十年代的第三次“华侨研究热”。

[作者李安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谢维】